



蔡昉：共同富裕与人力 资本改善



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|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

文/蔡昉

我们知道，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共同富裕。到底怎么看共同富裕的三个分配领域？它是零和博弈，还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？我从自己的一些研究领域得出一个判断，叫做三个分配领域都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。



先说几句开场白，把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，也是现实需要结合起来，看一看共同富裕三个分配领域。

其实共同富裕的说法不是最近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来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的重要文件中一直在讲，包括邓小平最初启动改革时的重要讲话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十四大，我们

一直都讲共同富裕。

现在提出来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一个重申，但是它有特殊的针对性和当前的紧迫性。

我先讲四个点：第一，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，从过去做大蛋糕到现在分好蛋糕，并不是完全的转向。方向是一致的，但更加强调共享发展成果，前提是做大蛋糕。

第二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，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，从而更好地分蛋糕，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。

第三，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，性质不完全一样，重点也不完全一样，有各自的定位，因此是互补的。

第四，我今天不是全面讲改革红利，而是挑出一些重点。重点是什么呢？一是把改善民生，提高生产率，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；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。

三次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，简单做一个概括。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，因为在初次分配领域，我们配置生产要素、配置资源，决定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多少报酬，创造出激励和效率。因此，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时，初次分配是最重要、最基础的。

从再分配角度来看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供给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，当政府有了这个职能是一个硬约束的时候，可以减少政府在一些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过多越俎代庖。同时，这是一个生产率分享的必要途径，也是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这个终极手段，共同富裕可能达不到。

第三次分配，我想强调的是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百分数。现在很多企业觉得我要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因此大家就纷纷拿出钱来，这很重要，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上，按 GDP 的占比来说，我们的捐款、慈善事业确实不够发达。

但是我想说，第三次分配包括自愿捐助、慈善事业、自愿者行动、社会责任等等，对企业来说，社会责任以人为中心，更加关注员工，更加关注社会，同时兼顾社区，兼顾自己的伙伴、客户等等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。但是，它归根结底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种有益的补充。

共同富裕要达到什么目标？目标很多，但有一个硬目标，大家可能忽略了。我们要保持适度的合理的增长速度区间，按照党的十九届九中全会的要求，2025 年我们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2035 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。

第一个目标是按照人均 GDP 超过 12000 美元，第二个目标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那一组，相当于 23000 美元。含义是什么呢？意味着今后 15 年，GDP 总量也好，人均 GDP 也好，要翻一番。因为我们的人口前期会增长，后期是负增长。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计，GDP 总量和人均 GDP 未

来可以是一致的，至少 15 年是这样，因此翻一番是一个硬目标。

翻一番是不是能转化成居民收入？转化成居民收入是不是能变成合理的分配？还有，必须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，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。

有效的、实质性的是什么含义呢？就是要把基尼系数降到 0.4 以下。如果高于 0.4，就没法说这是共同富裕。

目前，我们基尼系数大概是 0.465，设想我们到 2025 年能够降到接近 0.4，到 2035 年努力向 0.35，至少是显著低于 0.4 的水平靠近。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，利用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也可以叫社会福利体系。

首先，从初次分配开始说，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。我今天讲的改革红利大部分是说，如何通过分好蛋糕来做大蛋糕。做大蛋糕，作为经济学的定义就是提高生产率。因此，生产率的核心是资源重新配置，并不是我们强调再分配，初次分配领域就没有事情可做了，其实有大量的空间。

在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，一家投资公司做的推算认为，在最糟的情况下，中国 GDP15 年翻一番的目标可能达不到，相应的也就在 2030 年实现不了赶超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。

原因是什么呢？它拿中国和美国的生育率做了比较。第一，中国的生

育率显著低于美国，我们是 1.3，美国是 1.6-1.7 的水平。第二，美国有移民政策，可以从外国引进劳动力，中国没有这个政策。当然了，我想我们中国也不适合大规模采取这样的政策。

这个推算相应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未来美国的劳动力是增长的，中国的劳动力是负增长的。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中的重要贡献成分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迅速回落，回落到大体上跟美国一样，也就没法在 2030 年左右超过美国。

其实这个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缺陷，它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来自于劳动人口。按照这个来说，我们从 2010 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，当然劳动力是负增长。但是，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，劳动力从农业低生产率的就业中，转向非农产业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中，这是主要的来源。

比较一下，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是 1%，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 23.4%，一个百分点对中国来说是 800 多万劳动力。我做了这张图，横坐标的起点是中国，中国人均 GDP 一万美元，之后的国家和地区，都是人均 GDP 在一万美元之上的，一直到最高水平。

这就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径。蓝色的线表示城市化率，意味着我们今后城市化率仍然要实质性地提高。橙色的线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，意味着我们未来农业劳动力比重要持续下降。

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形。第一，假设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，能够实质性下降 10 个百分点，就可以增加 8000 多万劳动力。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实现每年 2.7 的增长率，就不是负的，而是一个显著的正增长。它会改善劳动力供给，改善人力资本的需要，资源重新配置，提高生产率，使我们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速度更加缓慢，支撑中国的潜在增长率。这是供给侧的趋势，它改善我们的生产函数。

第二，从需求侧来看，未来城市化率要显著提高。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，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，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中等偏上中的偏上，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。

我们先不设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多少，而是设想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 63.9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45.4%，两者 18.5 个百分点的差距把它填平了，也只是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。已经在城里但没有户口的，让这 18.5 个百分点的人口得到城市户口，就可以增加 2.6 亿城市户籍人口。

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他在城里，过去没有户口，现在得到户口了，其实很有意义。OECD 的专家们做了一个模拟，中国社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模拟，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。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，当得到了城市户口，即使工资没有上涨，其他的改善没发生，仅仅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，消费可以提高 30%。

另一个结论是，这种预期会加速人们向城镇的转移，从农村转到城市，

还没得户口之前，仅仅因为转移消费也可以提高 30%。因此，从需求侧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好的支撑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。

城镇化更加规范，也就意味着就业更加正规化。目前我们就业还有不正规的趋势，城镇就业分成不同的形态，其中没有被登记在内的，临时雇佣、不签定劳动合同的人，加上个体就业，不规范的程度比较重。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，就业不够稳定，社会保障不够健全，会影响他们的收入、社会流动和消费。这部分加起来占 30%，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。因此，改善这种状况是提高社会流动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。

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个 2020 年全球社会流动报告，给每一个国家打一个社会流动性的分值，在中国的分值中又有分项，分项得分有三项是低于平均分的，其中一个就是低报酬人口占比太高，这和我们的就业不够正规、不够稳定、工资不够高相关，改善了这种状况以后，可以取得更加常规的城镇化。

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个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可能有人不习惯听建立一个福利国家，其实它的含义差不多。过去西方人讲从摇篮到坟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5391

